

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

第二辑

(内部读物)

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

第二辑

資產階級社會學資料選輯

第二輯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1965年4月第1版

1965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2074·297 定價：0.36元

編者說明

本书是《資產階級社会学資料选輯》第二輯，选的是勃萊凱特的《原子武器与东西方关系》。

勃萊凱特(Blackett, Patrick Maynard Stuart, 1897—)，英国物理学家，皇家学会會員，伦敦大学帝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1948年得諾贝尔物理学奖金。其著作，除本书外，尚有《原子能的軍事和政治后果》(1948)、《战争的研究》(1962)及原子物理和核物理、宇宙射綫方面的論文。

本书系内部讀物，公开引用譯文时，务請复查原文，并請用原著版本和頁碼。

由于我們人力有限，本书在翻譯和編輯等方面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讀者指正。

《哲学研究》編輯部

1964年11月

原子武器与东西方关系

P. M. S. 勃萊凱特 著

秋 涛 译

前 言

剑桥市三一学院的校长和教师们曾邀我去作李氏·諾尔斯(Lees Knowles)軍事科学讲演,我愿在此表示深切的感激。我选择的题目是当前軍事思想所面临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原子武器对于战争和对于东西方强国集团间关系的影响。本书的三章,差不多完全是按照1956年春天所作的那三次讲演写成的。

在第一章里,我概括地叙述了目前西方軍、政界关于原子武器在西方軍事规划中的任务问题的尖锐爭論,叙述了各方面所想到、談到和写到的东西。

在第二章里,我收集了关于原子武器、它们的运载工具和对它们的防御方面的那些已经公布的主要事实;这些事实,对于了解目前爭論的事实基础看来具有头等重要性。

在最后一章里,我努力做了两件事。我力图从过去十年的各种各样事件中,抽出那些比較重要的主观因素,包括政治的和个人的;在我看来,它们对于造成过去和目前輿論的一般趋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除非記住这些因素,否則,在目前值得注意的局势中,許多事情必然仍是难以理解的。最后,我带着很大的試驗性质,并且純粹用提綱形式,概述了某些据我看来应该是未来軍事政策的指导路綫的观点。

我愿感謝剑桥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迅速出版而作了非常有效的安排;同时感謝我的几位朋友閱讀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勃萊凱特(P. M. S. Blackett)

1956年5月于伦敦

P. M. S. BLACKETT

ATOMIC WEAPONS
AND
EAST-WEST RELATION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6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本译出

第一章

原子武器和西方的軍事政策

一

当前西方軍事思想的混乱，反映出从西方垄断原子武器时期轉变到东西方原子均势时期这一个过渡期所必然遭到的許多困难和复杂性。我們所最重視的各种軍事学說，許多都是在1949年以前形成的，当时并不存在苏联进行原子袭击的可能性。现在这种可能性既已存在，許多这类軍事学說就必须加以彻底修改。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理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极大的障碍。一方面，这一問題的概念上的困难是严重的：正面的和反面的議論，紛歧复杂，常常难以捉摸，甚至，还常常滑到缺少实际內容的天真的咬文嚼字中去。另一方面，准备进行原子战争的种种方法还正在受到广泛的批判分析，可是为了准备这些方法，在軍事物資和軍事訓練方面却已經浪費了大量資源。

要制定一項防御政策，使它在軍事上是适合的，同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又是可以接受的，这件事，也許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困难。

当前軍事思想中明智的见解的重要性是不会被強調得過份的。但是，它之所以这样重要，我认为，并不是由于人們通常所讲的那些原因。人們普遍公认：东西方之間爆发一次全面大战的危險，在目前是很小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都占有了原子彈和氢彈，因而都占有了使彼此遭到巨大破坏的威力。同时，一次小規模战争

偶然地滑到一场大战去的机会，也并不是很大的。朝鮮和印度支那的有限战争，都没有引起世界大战。而且，这还是氢弹的威力被人们广泛了解以前的事。现在既然大家对氢弹的威力都清楚了，既然双方都有了氢弹，那末，局势稳定的趋向就更强了。

看来，某种不合理的军事政策当前的不良后果，与其说是增加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險，倒不如说是引起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使西方冒着从中东这类地区丧失权力和影响的危險，而西方目前的繁荣，是密切地依靠这些地区的。

按照以往十年中的军事思想，如果我们在准备全面的、战略性的原子战争上耗费的资源太少了，我们就冒着被苏联侵犯的危險。另一方面，现在很清楚：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耗费得太多了，那末，进行有限战争所用的常规武器方面的资源，就所剩无几了。

西方的军事政策应该通情达理，这不仅对我们的军事安全和经济福利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重要的。此外，如果可能的話，它应该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居民，还要对世界上的非西方国家和非苏维埃国家的亿万人民的领袖們，都表现为通情达理。在那些国家里，有的中立主义是潜在的，有的中立主义已经很强烈；但是，那些领袖們的友谊，对西方来说很重要。用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話来说，那些领袖們“在俄国与西方夺取世界霸权的竞争中，也許掌握着决定的一票。”^① 不明智的军事战略和随之而来的不明智的外交政策，会使得西方丧失(有些人也許会说已丧失了)重要的信誉资产，以及军事基地和经济利益等更为实际的资产。

西方的防御政策应该对全世界表现出合情合理，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其进一步的理由可以从裁军和管制原子武器問題上看起来。为了使西方的建議在联合国得到足够的支持，必須使为数众多的不結盟国家心服，使它們看到我們的建議，既是通情达理的，又是适时的。

① A. 湯因比：《文明在考驗中》(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出版)，第166頁；
《世界与西方》(牛津大学出版社，1913年出版)，第7頁。

因此，这些建議必須是容易理解的。

在第二章里，我将稍为詳細地討論原子武器本身和運載它們的航空工具及火箭，并討論各种防禦原子武器措施的效率。为了目前的討論，只要把我們的論据放在以下的假定基础上就够了——对于一次大规模的、决定性的对城市和居民中心的原子袭击，现在并没有有效的防禦办法，最近也看不到有这样的办法。就战略空軍威力來說，进攻现在肯定地已經比防禦占了上风，而且这一点对东方和西方是同样适合的。

这种形势，常常被人們說成是：现在存在着战略原子力量的相持局面；或者說，如果现在还没有达到的話，很快也就要达到这种局面了。

在考虑这种相持局面已經达到什么程度，或者还要等待多久才会达到这种局面这一問題中，注意下述情况是恰当的：为了规划英国的武装力量，为了在三个軍种和各种武器上分配軍事預算，必須考虑到的是未来的世界形势，而不是目前的世界形势。

各种武器的設計、发展和发給部队使用，都要花費几年的时间；而且各种軍事任务的改革和人員訓練，也是一个緩慢的过程。因此，西方现行防禦规划方式的任何改变，都必须至少以几年后可能出現的战略地位为基础。

因此，如果我們重視西方武装力量組成的1960年近期规划的話，把规划建立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上将是明智的——那时，东方和西方，在軍事技术和原子技术方面，大体上将是势均力敌的。

这样一来，我們就逐漸回复到几个世紀以来軍事规划中的正常的假定上来了：这就是假定，从人对人或枪炮对枪炮平均起来看，敌人和我們是相等的。在实践中，这种假定有时証明是正确的；在战争中，有时会发现自己处于优势，有时則处于劣势。

通过計算敌我双方現有人員、枪炮、坦克、飞机、軍艦的数量，来估計軍事力量对比，把这种传统的方法用于进行规划的时候，包含着假定双方在技术水平上大体均等的意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協約國方面的勝利，主要是由於他們在數量上對德國的優勢，而肯定不是由於任何全面的技術優勢。

二

我希望從這一假定出發來詳細討論當前的問題，即：在東西方之間已經存在着一個戰略原子相持局面，因而，雙方進行全面的總體戰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然而，即使人們接受了這一結論，就象我想它應該被接受的那樣，各種困難問題還是會發生，其中一部分是軍事性質的，一部分是政治性質的。為了防止總體戰爭，我們的國防預算中，應該用多少錢來準備戰略原子轟炸，用多少錢在防空方面，用多少錢來搞常規武裝力量？一個細小的但是迫切的問題是：英國關於自己的氫彈計劃應該怎麼辦？英國首相反對停止一切爆炸試驗（直到我們至少搞出了第一次試驗為止）這件事，理由充足到什麼程度？如果別的国家也提出類似的要求，英國的態度應該怎樣？

我要一開始就說清楚，我並不想具體回答那些問題。我希望做的，只是試圖提供一些看來必須加以考慮的一些主要事實和論證。在國防領域里，任何具體的實際的決定，不可避免地必定是各種互相沖突的要求實行妥協的結果：這類實際政策只有讓專家們接觸全部事實，才能制訂出來。這裡我只想努力描繪出基本的背景，並提出某些廣泛結論的要點。

在我看來，當前制定一項合理的軍事政策的最大困難主要並不產生於對原子武器的直接物質破壞作用有任何重大懷疑，或者對放射性微塵對距離比較遠的地方的影響還有什麼重大懷疑。

然而，應該記住，由於大規模使用原子武器造成的大氣污染，究竟會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多大的生物學影響，在科學上仍然是一項重大的沒搞清楚的問題。為了本書進行論證，我將假定：單是這些可能有的生物學影響，目前還沒有被西方認為嚴重到要防止在戰爭中大規模使用原子武器（至少其中的幾種）。然而，進一步的研究工作，

也可能使这一假定站不住脚。

当然,关于如何把原子武器发射到它们的目标去的问题,以及如何截击、摧毁敌方的运载工具的反面问题,显然都还有不少情况没搞明白。然而,在下一章,我们将要论证,那些没搞明白的情况,并没有超过一般备战工作中的正常限度,而对于军事规划来说,也不见得有什么决定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制定一项可以接受的防御政策的主要困难,是对全国城市居民准备自己承担原子袭击风险到什么程度没有把握。这种准备程度,将取决于居民的精神面貌,而他们对于危险的结局以及活命的机会的估计,又将影响到他们的精神面貌。人们会明白,英国官方的防御政策中的一项基本因素,就是英国应该能够在这场袭击之后生存下去。如果不是这样,政策的大部分就必须改变。

西方官方的军事政策,直到最近,一直都给原子武器规定了三项主要任务:作为防止战争爆发的“伟大威慑力量”;如果战争爆发,就用作“大规模报复”的手段,通过摧毁敌方的城市来赢得这样一次战争的胜利;在地面战争中用作战术武器来抵消敌方受过训练的战斗人员的优势。当前西方军事规划主要地是以在战术任务中使用原子武器为基础的:在欧洲盟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系统内,战术原子武器已经取得了常规武器的地位。

当西方完全占有,或者近乎完全占有原子武器的垄断地位的时候,这三项任务可能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但是,现在苏联既已有原子武器的大量贮存,这些任务显然就得重新考虑了。

首先应该注意:西方一般相信,这三项任务中的第三项,即把原子武器作为对地面部队的战术上的支持,对西方的政策来说,将会象我们垄断原子武器时期一样有帮助。因为从已经公布的具体的军事研究来看,^①好象这样假定也能叫人认为还说得过去——双方在

① F. O. 密克歇:《原子武器与陆军》(伦敦费倍尔出版社,1955年出版);
G. C. 林哈特脱与 W. R. 金脱纳:《在地面战斗中的原子武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哈立斯堡,军事科学出版公司)。

地面战役中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倾向于使守方比攻方更为有利，从而导致地面的战术上的军事相持局面。这是因为，传统的进攻所要求的军队大量集中，将无法实现——集中起的军队会给原子轰炸提供非常好的目标。

既然许多西方军事规划近来都涉及到用劣势兵力来阻止一场来自东方的对欧洲的地面侵犯，所以，在战术任务中使用原子武器普遍被认为对西方有利，虽然东方也同样可以利用这种武器。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一判断可能证明是错误的，正如许多其他军事判断过去曾证明是错误的。一支经过良好训练和拥有大量装备的地面部队，是在攻击作战中有效地利用战术原子武器的。利用这种武器，可以在敌方的防御体系中炸开一个缺口。特别设计的、能尽量防爆炸和防热射线的装甲车，可以越过这种缺口。伽玛射线（ γ 射线）只能被装甲遮断一部分；但是这种射线并不会使人立即丧失战斗力，而只在很久以后才造成疾病或死亡。如果这种军事行动能证明是有高度成效的，那末很清楚，战术原子武器说不定将不再对西方绝对有利了。

然而，为了目前的讨论，我希望这样提出目前西方的正常假定：在战术上使用原子弹大概对西方比对东方有利，因而这种使用并不受苏联方面貯存量增长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战略上使用原子弹来对付敌方的城市和工业地区，不论是作为防止全面战争的威慑力量还是作为在战争中赢得胜利的手段，都已经由于苏联的原子弹和氢弹貯存量的不断增长，而大受影响。例如：如果设想苏联会使用地面部队进行某些实质性的但是局部性的侵略，那末，使用原子武器的老概念，就会导致对苏联本土进行战略性的原子袭击。

现在不能设想，如果苏联的一些城市被从欧洲基地起飞的原子轰炸机所摧毁，它竟会不对西欧的那些防御脆弱并且容易达到的城市给以同样的回答。就积极防空的现有水平来看，某些原子弹和氢弹会打中目标，是没有疑问的。

可是，在西欧，哪儿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来准备应付对城市的原子轰炸。不论英国、法国、德国还是意大利，都没有做过任何有效的民间防卫准备工作。认真做好这项工作，意味着要进行许多非常细致和开支浩大的准备工作，包括深厚的防空洞、现有建筑物的加固、紧急运输和疏散人口的各种安排、对全国各收容地区的供应、粮食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贮存，等等。而且，即使这些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如果面临由此而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那末损失和伤亡都将是极为巨大的。

毫无疑问，正是西方城市对苏联的原子袭击和俄国城市对西方的原子袭击在防御上的脆弱，导致了下述结论：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会冒全面战争的危险。

三

英国的国防政策，正如过去三个年度的白皮书中所详细说明的，包含有下述思想：任何重大的陆上侵略，都会遇到西方使用战略的和战术的原子武器的反击。

《泰晤士报》军事记者最近（1955年12月1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部前线的不平静》的文章，讨论了欧洲的军事形势。文章作者把实施上述政策的困难，突出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他提到“人们越来越理解到，大规模报复已经不再是一桩单方面的事情”之后，继续写道：“最严重的局面也许就是，正当核武器由于变成自杀性的武器而似乎已经摧毁了它们的目标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在波罗的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面部队现在却处于最薄弱的地位。”文章的作者接着就极其清楚地叙述了对于这一局面的各种可能的反应。

文章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单纯依靠战略原子轰炸，而在欧洲大陆上只保持一支略多于警察力量的军队，这是不可能实行的。这种只让薄弱的地面部队起“绊脚索”作用的政策，会使西方为了阻止一次相当小规模侵略，反而牵连进触发一场完全的战略原子战争。显然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且不说可以预料敌方会对西方进行原子

反攻，就說这样的懲罰同罪行之間也將大不相稱。这样办既不可能，敌人就很能够放心地进行零零碎碎的侵略了。

另一个极端是完全依靠常规武器。这种可能性也是被排除的，因为这会使西方必須对东方进行个对个的竞赛。他认为，这种竞赛会使西方走向經濟破产。

折中的办法是只使用击败侵略所必需的力量，包括战术原子武器在內，来对抗侵略。这样做只是为强迫敌人放弃它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追求对方的无条件投降。这是一項使懲罰适合于罪行的政策，它常常被认为属于一种“有分寸的威懾政策”。

这位《泰晤士报》記者証明，既然双方都有这种原子武器和运送手段，既然使用这种武器会意味着共同自杀，那末，同东方达成一項限于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協議，是有可能的。

有两位强有力的拥护者，认为这种“有分寸的威懾政策”对英国来说是适当的。他們是上尉李德尔·赫德(Liddell Hart)和海軍少将安东尼·布查爵士(Sir Anthony Buzzard)。赫德在1955年8月給《泰晤士报》的信里，对于氢弹作为防止大规模侵略的威懾力量，作了一番細緻的分析，但他认为，“作为防止較小侵略的威懾力量，或者作为防止无意地滑向共同自杀的全面大战的制动器，氢弹是远为不可靠的。”他接着說：“当前以氢弹为基础的国防政策的基本缺点，就在于氢弹正在变成一种‘要末全胜，要末毁灭’的武器。使用核武器的全面战争的前景是那么可怕，以致人們对于不是明显构成重大威胁的任何侵略的反应是：犹豫不决、拖延时间和軟弱无能。”

在考虑了对这项計劃的主要的、显著的反对意见以后，赫德断言：“现在，我們是倒霉到了极点。由于缺乏明确性，往往会造成以最大的代价来换取最小的安全。”

布查少将对贊成和反对有分寸的威懾政策的各种議論作了一番周密的、詳尽的分析，并断言，这种政策肯定是可取的，并且大致上是可能实行的^①。他为这项政策的可取性所提出的論証很有力。因为，除非能够作出这样一个战略和战术的區別，否則西方也許会由于害

怕有限战争很快地发展成为全面的战略原子战争（这是西方完全没有准备来进行的），而无法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来进行有限战争。

布查少将十分强调这一点：战略原子相持局面的出现，并不就意味着一个一般军事相持局面，因为东方国家仍然拥有巨大的地面部队的优势。据他看来，西方只有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才能应付这种优势。因此，有分寸的威慑政策实质上是要同样造成一个战术上的相持局面。

在和平时期确认原子武器的战术和战略用途的区别，并使之在战时仍然保持效力，这样做的可能性问题是十分复杂、十分难于回答的。

从根本上说，可以作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区别：战略轰炸目标和战术轰炸目标之间的区别；世界范围内要害地区和非要害地区之间的区别；小型原子炸弹和大型原子炸弹（包括氢弹）之间的区别。

如果我对布查少将的观点理解得正确的話，他的意见就是：这些区别的某种综合，可以作为西方行动的实际指针，而苏联方面如果也加以遵循，那对它也是有利的。然而，他认为西方不应该在事先就很明确地提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将使用三种力量，即：仅仅使用常规武器，或者常规武器加战术原子武器；或者是一切武器，包括战略原子武器。显而易见，他的建议就是，西方应该单方面地声明：它打算把原子武器的使用，限制在抵抗任何明确的侵略所必需的最小限度以内，但是它不应该预先就详细规定，它在任何具体情况下究竟会实施什么样的具体限制。人们会记得，《泰晤士报》的那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与其作单方面声明，不如试图去同苏联谈判这样一项共同的协议。

《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题为《城市和炸弹》的社论中写道：“正統的軍事參謀人員也許會說安東尼·布查爵士的提議是‘荒唐和行不

① 《国际事务》，第32期（1953年）第148頁；《曼彻斯特卫报》1955年10月31日；《旁观者》1956年3月9日。

通的’。……其实这些提議既不荒唐，也不是行不通的——并且，除非采取某些这一类的政策，軍事部門將感到越来越难于說服公众承认常规部队还有什么保留的价值。……如果任何大战意味着許多城市立即遭到战略轰炸，那末何必花錢在欧洲駐扎許多軍隊？……如果軍隊沒有核武器就不能有效地作战（而这些核武器是会引起战略轰炸的），那末何必为二年兵役制和每年几百万鎊的支出煩惱呢？”

空軍元帥斯烈塞爵士(Sir John Slessor)在回答布查少將時，也有力地論証了准备有限战争的重要性。他說：“我們必須有能力和决心在这些情况下使用有限手段——換句話說，使用空軍掩护和支援下的地面部队，来对付有限侵略。这是一項不受欢迎的看法，特別在美国是如此；但这是我們必須重視的看法之一，如果我們对較小的和遙远的盟国要承担义务的話。不愿意这样办，就会落得一场象尼克松副總統所說的‘一口一口地被咬死’的結果。”^①另一方面，他认为即使西方充分使用战术原子武器，也不能使西方赶得上苏联在欧洲的地面战术力量。因此，他有力地断言，即使有分寸的威懾是一項可行的政策，它也不见得是一項成功的政策，除非是在非要害地区。所以，据他看来，西方的战略原子打击力量，作为伟大的威懾手段，在对付任何侵略（除了很不重要的侵略以外）中，仍然保有它的头等重要的作用。

这样說来，斯烈塞爵士的见解，即西方即使靠了战术核武器，在地面上还是比不上东方，也許确实是不錯的。可是，这无论如何不能导致可能回复到大規模报复政策的結論，除非把它当作自杀的最后手段。以为駁倒了对方的論据，就能使自己的論据自动地成立，这是一种常见的錯誤。

英国供应部的一位高級科学家庫克朋博士(Dr. R. Cockburn)，在1955年11月，以个人名义在皇家陆海軍学院講話时，駁斥了有分寸的威懾政策，认为这是不可能实行的。同时，他提出了另一个他

① 《国际事务》，第32期(1956年)第158頁。